

序跋精粹

让城市个性流淌

陈圣来

城市是卷帙浩繁的大书。无论是锦绣辉煌的都市还是素朴安逸的小城，都像一部部敞开着扉页的巨制，里面有波澜壮阔、激湍澎湃、金戈铁马、歌舞升平、万家灯火、声色犬马、光怪陆离、云谲波诡……一个个跌宕起伏的故事，一曲曲抑扬顿挫的旋律，从城市流出。城市是贮存文化、创造文化、政治转文化的容器，是文化、社会和政治创新的重要孵化器。

本世纪一十年代开始，全世界一半以上的人口就居住在城市，而且这种聚集正在以越来越快的速度递进。在城市化的潮流中，中国一马当先，以世界范围从未有过的记录推进城市化的进程。这种嬗变既是时代的必然，时代的进步，又是时代的代偿，时代的无奈。

由于城市化在中国不是单兵突进，而是与全球化、信息化不期而至、齐头并进，这三股浪潮汹涌而至，席卷神州大地，这种叠合加之行政权力高度集中，就产生了这样一种现象：但凡现代化全球化浪潮所过之处，往往摧枯拉朽，淹没了他各各相异、独具特色的城市文化。最突出的是城市同质化的倾向日趋严重，无论徜徉在沿海城市还是内陆城市，脚踩在东海之滨还是西南边陲，你都会恍惚难辨城市的差异。城市文化的肤浅化、粗俗化、娱乐化、商业化日趋严重，消解和衰退了城市的传统习俗和审美旨趣，抹平和削损着城市的文化特色，瓦解和摧毁着城市的心乡依托。

一座城市只有具备了有特色的文化，才有可能以卓尔不群的姿态屹立于世界城市之林。换句话说，一座城市必须应该有自己独树一帜的身份标识，而这种身份的背后就是特色。怎样在推进城市化进程中，保持并强化城市的特色文化，避免同质化的危机，

避免千城一面的困境，让不同族群在不同文化的物化形态中，找到自己心旷神怡的栖息之地，找到自己灵魂归宿的精神家园，这是中国社会面临的重大课题。

由于工作的关系，我走过近百个国家，到过无数的城市。记得平生去国外第一个大城市就是苏格兰的爱丁堡，它凄婉的风笛和男士格子裙的浪漫令我印象深刻，而爱丁堡城市之“古旧”更令我感慨万端；而后我去之仅一小时车程的格拉斯哥，相比较爱丁堡有现在一新的感觉。英国的创意产业是全世界的翘楚，而格拉斯哥则是它创意产业的重镇，这座城市曾诞生像经济学家亚当·斯密和力学家瓦特这样世界级的人物。最后驱车去伦敦，那更是大不列颠日不落帝国的心脏，它的繁华辉煌令当时的我有目不暇接之感。

后来，我又去了法国戛纳、意大利威尼斯、瑞士达沃斯等，这些欧洲小城以城市的特色彪炳全球。她们身份的标识昭然若揭，令世人艳羡不已。我还陆续参加了世界上无数的艺术节，从阿维尼翁的戏剧节到波哥大艺术节一直到潘普罗纳奔牛节，这些城市的节庆活动使城市身份更得到彰显。我也穿越时间隧道，来到近两千年前的

庞贝，置身于这座曾被火山岩灰湮灭的城市，拂去历史的尘埃，当年的城市如此真实地再现和袒露在我的面前，使我有一种灵魂的震撼。这就是城市！多么不可思议。

1980年代去香港，很惊奇铜锣湾、弥敦道鳞次栉比的商铺，但上海很快做到了；以后去美国，在洛杉矶一家麦当劳店里吃汉堡包和冰淇淋，很欣赏这样的快捷与规范，不久上海也有了遍地开花的各式快餐；再以后去墨尔本，看到夜晚满天星的灯饰环绕着松树树干，煞是漂亮，现在上海南京西路那一段满天星的灯饰更是璀璨一片，比起墨尔本有过之而无不及；再以后去德国，在柏林爱乐乐团的现代音乐厅里听交响乐，曾希望上海也能有这样现代的音乐厅，现在类似的现代音乐厅和歌剧院已纷纷崛起……上海如此，全国亦然，中国的城市正在大步地追赶，日益跻身世界先进城市的行列。

然而全球化与城市化是把双刃剑，它固然有开放、宽容、沟通、融合的积极一面，但也会产生遏制多元、窒息个性、催生趋同的弊端。1990年代我作为中青年的代表，应邀大利亚政府和德国政府的邀请，去访问这两个国家，他们给我的权利是我可以去

任何地方随意造访，政府全力配合并提供所有资金。那时国门刚刚打开，我急于去那些我耳熟能详的城市，但后来发觉这是一个愚蠢的选择，因为我去的几乎都是大城市，应着了托尔斯泰的那句名言，我将其套用：大城市都是相像的，而小城市各有各的不同。因为小城市还未受到全球化的侵袭，还往往保持着天然去粉饰的本真和特色。

其实，我当时看到大城市的雷同，也是一种物化的表象，没看到城市的气质与灵魂——从这一意义上来说，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，每一座城市的社群都生活在“自己”的城市里。比如说北京和上海，中国最大的两座城市，街区域貌有太多的相像相近之处，但内骨子里，却大相径庭。这与这两座城市培养出来的社群有很大关系，皇城根下与十里洋场是不一样的，胡同生活与弄堂生活也是不一样的，具体表现在理念规约、风格习俗、饮食衣着、语言品性、待人处世等各方面。还记得刚到英伦，首先就被街隅的红头发的朋克所惊诧，后来才知道这是一种标新立异。当刚看到年轻女性内长外短的装束以及膝盖破损的牛仔褲，也疑惑一时，后来才知道

这是一种前卫时尚。时尚开始一定是种独特和别致，风乍起，吹皱一池春水，然层层涟漪波及开去，标异就变成流行，而流行就成为趋同和效仿。这是一种规律，个性与共性就这样相生相克。

建设特色文化城市最早出现在十七届六中全会公报里，仅仅只是一句话，但被理论界人士很敏感地捕捉到了，列在公布的国家社科重大课题里。那一年我已到了社科院，萦萦于心的这个题目让我梦牵魂绕，当年的春节都没有过好。投标文件交上去以后，初评欣然入围。那时国家重大课题入围后需要赴京面答。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的所长、著名社会学家陆学艺教授担任我的主考官，其他还有厦门大学、浙江大学、武汉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的教授。其实当时我都不熟悉他们，甚至连陆学艺教授也不认识，因为社会学和文化学毕竟还是两个不同的学术圈。我的优势在于我的职业经历、国际视野，以及创新思维。尤其在大型特色活动铸就城市文化特色、精神风貌以及气质内涵方面，我作了相当淋漓酣畅的阐述。面试不久，我率团去美洲访问，在回国这一天，我接到同事们的短信，热烈祝贺我中了国家重大课题。

在以后悉心研究的日子里，我和我的同事们广泛进行社会考察和田野调查，数次出国去收集案例，我们还承担了中国文化部与欧盟联合举办的“欧洲文化之都”与“东亚文化之都”论坛的学术策划，从中收集数据与实例，进行实证研究……现在，作为研究成果的这本五十万字的《城市的救赎》即将由人民出版社付梓出版。我相信它将融入“城市”这部五光十色的大书中，并成为这部巨制中的一个有意思的篇章。

父亲教我做年糕

孙宽 [新加坡]

我离开故土二十五年了，眷恋乡土，思念亲人的情感从未淡化，反而越老越浓。特别是农历新年前，新加坡到处开始张灯结彩，年味越来越浓郁时，我就越想念小时候过年的种种滋味。最令我思念的，或最满意的竟然是这一口——炸年糕，北京人爱吃的那种白年糕。

我小时候，和我父母都在北大荒建设兵团，那时生活非常艰苦。我的父母家在北京，过年我们都能收到一些从北京寄来的特产年货，比如白年糕。后来父亲跟当地老乡换白糯米，再自己磨成粉，给我们做年糕。父亲擅长做我们回族清真风味的年糕，他会做的品种可多了，单说年糕就有盆糕、馅糕、米糕、豆面糕、塔糕、艾窝窝、驴打滚、卷糕、藕丝糕等十多种。可是我最爱吃的，我最思念的年货儿，就是炸白年糕，白色的一坨一坨，用白糯米做成的，圆圆的小坨中间都有个红点。

大年三十晚上包完饺子，父亲就做年糕。开始我就依偎在他旁边看着，问这问那。母亲总不愿他做多了，因为炸年糕很费油，他就说：“看，孩子都盼了一天了。”他边给我讲故事，他边干活。后来，他就干脆教我。他先用凉水和小块糯米粉团，他的拇指好像计量单位的分割器，在小盆边上一挑，就分割出一个小球，最奇妙的是每个小球都一般大，他把小球放在手心上，两只手合上对着一转，一碾，再一按，就成一小坨，我眼看着他一转一转的，就好像变戏法一样，一坨坨就做好了，真是太神奇了。

他把分割出来的小球递给我一个，让我放在手掌心上，把它一边转，一边按成坨状。我看着挺容易，但真操作起来，那可是个技术活儿。我的这坨拍来拍去，也拍不圆。母亲就说：“别让孩子玩儿面！浪费一丁点就是好几粒粮食。”父亲看看我，我瞧瞧父亲，我们赶快地异口同声说：“知道了！”

他总保持我的“原创”，把我完成的形状怪异、圆不圆、方不方的年糕坨，认真地摆在盖帘上，最后，让我用小手沾一点食用红彩，在我的年糕坨中间点一下，好像完成一个伟大的杰作精品。“这是你的，明天早上爸爸给你炸！”然后他把一个个糯米碾成的小坨，放在铺好湿布的笼屉上蒸十五分钟，稍微凉一下，年糕坨一点都不粘屉，父亲轻轻用铲子铲起了这些白胖的年糕坨，再放回盖帘上，马上拿到屋外面冻上。东北天气冷，大概十分钟就冻硬了。他边把它们收到袋子里，边说：“看！你的最特别，爸爸一眼就认得出。”他说着把装满年糕坨的袋子搁在窗台上。

我总好像怕它跑了一样，睡觉前一定悄悄推开门溜出去，再看看窗台上那袋年糕坨。

第二天早上给父母拜了年，父亲就说：“爸爸这就炸年糕了！”我坐在炕桌旁边盼着炸年糕出锅的时间，似乎比三十晚上盼放烟花的时间还漫长。等待的时间越长，哈喇子流得越多。炸年糕是很需要耐心的，冰冻的年糕坨微微化冻才能炸，所以父亲在我没有起床前，已经把它们拿进屋里化着了。炸时油不能太热，须小火慢慢煎炸，一边炸一边轻轻地用筷子触敲，通常中间部分会鼓起大大小小的泡泡，刚出锅的年糕带着“吱吱”的响声上桌，吃的时候用筷子把泡泡捅破，撒上白糖。我通常是急不可待地一点咬下去，母亲总会在旁边说：“慢一点儿，别烫了嘴，烫了心！”外面是焦脆的，里面黏黏的，能粘住筷子，白糖和年糕混合的口感，更增添了咀嚼的乐趣。

“看你做的这个多棒！”我一看，年糕颜色金灿灿的，那是父亲煎炸的火候掌握得好，但我做的怪胎其实没怎么起泡。原来做年糕坨的技巧，按、揉、碾、压和拍的方法是很有技巧的。后来，我年年都跟父亲学，直到我也能做得和他的一样好，一炸就能起大大的泡泡。这中间冒起的泡泡非常重要，因为它更预示着我们的生活，一年比一年“发”，一年比一年好。

这些久远的记忆从未真正离开我，每到年久，就回温慰着我思乡的心。

到曼塔，想，就是个小城吧。有海，有渔船，有海里鲜美的吞拿鱼，还遥遥南美安第斯山脉的山。是在夏日的赤道上，预料阳光异常凶猛，却还能忍受，走到树荫下，烘烤的热度褪一半。

莫小看曼塔，厄瓜多尔一个十多万人口的边城，1200年前即为一支印第安部落的首府，传下一绝活绝技：天下无双的草帽。

咦，草帽不是巴拿马的专利吗？巴拿马草帽之名，众所周知。

记得2010年上海世博会时，我遇见厄瓜多尔人，叫科雷亚。他送我一顶很有模样的白色草帽，特别说，巴拿马草帽，其实是厄瓜多尔人做的。听了有点一失所望，当时并未深究。

不想一个小小心，我万里迢迢到了厄瓜多尔，得以直面全世界出名的巴拿马草帽在原产地的“精打细作”。

巴拿马草帽盛名的源起：二十世纪初，几千万大军建造巴拿马运河。建造地近赤道，热带雨林，瘴热，炙晒，难以忍受的酷暑。巴拿马的邻居厄瓜多尔人便送上了降温的草帽，送上一片凉荫。之后，美国总统罗斯福来视察工程，也头戴草帽，手里挥动草帽，还在演讲词里对草帽颇多溢美之词。从此，不是巴拿马生产的巴拿马草帽，四海扬名。巴拿马草帽从低级到高级，20个层级，几千美元一顶草帽，不稀罕。据说世界最贵的一顶巴拿马草帽，十万美金，曾戴在英国王储头上。

那天，我们的车在曼塔驶到一处四通八达的市街中心，蓦然有人惊呼：“编草帽的女神啊。”女神是一座硕高大长的塑像：一个美丽端庄的女士，艳丽五彩的土布盛装长裙曳地，略弯腰，高耸的胸膛下，是一顶正在编织的草帽；草帽如一件神器，被她双手恭敬地捧着，圆圆的帽檐口，围一圈纤维流苏，瀑布般垂下。

又想起科雷亚，世博会那年送给我那顶巴拿马草帽的厄瓜多尔朋友。我曾对他说，哪一天到你的赤道之国去啊。他大笑：一切皆有可能。他说很久前，他就想到中国，到上海，一个很遥远的梦。但有一天，他的政府告诉他，你去世博会，看看发生奇迹的上海；你是100个官员里选出来的，带上50顶送给上海朋友的草帽吧。上天的恩赐，他

纽约西区大学城有一家古董级的巧克力店“蒙代尔”，快80岁了，很不起眼，藏在百老汇大街的灯红酒绿中。因为周遭太华丽喧嚣，它很难被发现——蒙代尔的装潢太老派了，只有一个上世纪中叶的简易霓虹灯。《纽约时报》的报道说：“您若不留心，甚至以为这是一家不再营业的铺子。”但是，它的生意红火得出人意料，它家的巧克力每年都会上纽约美食 Zagat 评级榜和纽约各大报刊的食评栏目。

走进这家湫隘小店，你会瞬间感到时光倒流，恍若走入了狄更斯笔下的杂货店，又像极了我童年时见过的江南小镇的货栈，说它是个古玩店都没错——糖果的古玩店。它细长，拥塞，店里到处是盒子摆盒子，货架上各种巧克力、糖果琳琅满目，大约只能容四位顾客站立。长长高高的玻璃柜台里，手写的价格标签早已泛黄——多年来，许多价格都没变，暗示着一种执拗的坚持。

它的巧克力品种多却朴实无华，一直用很普通的纸盒包装，没有花哨的装潢。主要产品都是用欧洲的古早工艺，坚持无糖。大约有各种自制的烤坚果、果脯巧克力、酒心和松露巧克力，以及各色黑巧克力。他们的坚持只有一点：只做巧克力之为巧克力之根本的产品——原料必用真的巧克力。这个口号

曼哈顿看过来

繁华都会里的怀旧巧克力店

海龙

看似有些古怪，但如果您知道现在市场上很多（哪怕名牌）巧克力并不是巧克力时，就会觉得它可贵了。

不做广告、不稀罕网路、不关注市场，在全美独此一家，别无分店，一心只做自己认可的好的巧克力——蒙代尔是怎样活下来的呢？首先靠的是老顾客。口口相传的老客们买它的产品已成了多年的习惯，老客也带新客，滚雪球。英人谚语“长寿造就长客”，说的就是这个店吧。

一如古风，它的店名就是店主名。创立主人卡尔·蒙代尔1942年开店，后来传给女儿佛洛伦丝。据考，蒙代尔是奥地利的二战难民，当年他们一家历经艰辛辗转逃生来到纽约，利用祖传的手艺谋生，就开了这家巧克力店。我跟店里的人聊天，对方用很重的欧洲口音

说，现代大工厂的巧克力多是合成的，且放了过多的奶和糖。蒙代尔巧克力不这样，全手工的纯正原料，是原汁原味的巧克力。这是一份家族手艺、一份尊严。他们要让世人知道：真正的巧克力应该是这样。

当然，这家小店也占了地利。它附近有几家著名大学——哥伦比亚大学、巴纳德学院、曼哈顿音乐学院、基督教与犹太神学院……许多人在上学时就是它的常客，几十年后带着儿女返校时发现这里的味道居然还在，回忆与感慨之余，自然要向孩子们推介当年的味道。有的子女又上了父亲的母校——美国名校有优惠校友子女的政策——这小小的巧克力店就成了一个时期，一种传统被几代人不知不觉延续了下来。纽约报纸曾采访一些1960年代的毕业生，他们

的孩子也上了自己的母校，吃了同样的蒙代尔，父母还会嘱咐孩子买巧克力带回家过圣诞、新年，忆旧中有恒久的温馨。

著名演员、四度奥斯卡影后凯瑟琳·赫本就是他多年的老顾客。她在信里称它是“世界上最好的巧克力”，常年长途驾车来这家巧克力店买自己心仪的甜品。蒙代尔将这封珍贵的感谢信低调地贴在收银台上。1997年，赫本的90岁生日时，蒙代尔送去了她最喜欢的巧克力组合。至今，仍有很多顾客特意来询问和点买“赫本什锦巧克力”。

著名经济学家、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院长格林·哈巴德，二十多年来也一直是在这里的常客。除了自用，他也把蒙代尔作为有意义的纽约特产赠人。哥大戏剧学院米歇尔剧场主任也用蒙代尔巧

为漫长的手工，才无比精致、珍贵，“那也是我们祖先传下的恩泽。”

闻之肃然。乌尔法罗的血脉里，有印第安人祖先的遗传。

还是致敬托奎拉。这有着长长纤维的像是叶也草的植物，生长在壮观起伏的安第斯山脉，蓬勃于赤道的厄瓜多尔土地，持续的高温 and 雨湿将其养育，使其坚韧，使其强固，使其柔软，使其阴凉。天赐人识，终被土著的印第安人挖掘而出，配以良好的手工编织工艺，先做成劳动者避风避雨物，后一步步演绎为绝世时尚精品。

离开曼塔的那个午后，我们徜徉在市中心草帽市场。满街的草帽店铺，满眼排列壮观的草帽，到处是双手高举草帽吆喝的人。还见一辆又一辆红色轿车黑色轿车浅色轿车，也整齐列队，每辆车的车身，皆被草帽遮蔽。车前车尾窗玻璃上，各种草帽上下左右挤簇，争奇斗艳——草帽原来可以这样气势磅礴热闹快乐地出售的。

一家售帽店，门前一巨大圆形草帽为广告招徕，但人群都为门前一编织草帽的老者吸引。她肤色黝黑，脸皮褶皱，人前倾，胸前压着一顶已经编织大

半的白色草帽，编织的手指异常灵巧。她的笑靥，仍可见年轻时姣好面容的韵味。乌尔法罗说：三十多年前，此处就这一家又小又破旧的草帽店，当年，这位大美女人便在店门口编织草帽，吸晴无数。三十年后，她早就是这家大店铺的女主人了，依然盈盈笑脸，不言不语，手指翻飞，编织不辍。

草帽，世人只闻巴拿马，谁人识得曼塔人。

但曼塔人，不辩。纠正巴拿马草帽为曼塔草帽？辛劳的曼塔人闻之一笑。真是“圣人之道为而不争”了。

上世纪七十年代，我痴迷的电影《人证》，有首悲怆的“草帽歌”：“妈妈，你可曾记得，你送给我那草帽？很久以前我失落了那草帽，它飘摇着坠入了峡谷，掉落在那山坳，就像你的心，离开了我的身边……”草帽让情感高扬，成为永逝的珍贵，乃至悲情的象征。

巴拿马草帽的名，终是成就了厄瓜多尔在草帽世界的飞扬和传奇——托奎拉草帽制作的草帽，已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选入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。

曼塔人，有滋有味地吟唱着自己的“草帽歌”。

笔会

什么？哪里？

(布面油画)

苏·肯宁顿 [英国]

